



HAL
open science

'Zichang duo ai, ai qi ye': Yang Xiong Fayan zhong dui
Shiji de lunshu yu chuancheng. Yi Handai rujia de wenti
wei li" : .

Béatrice L'Haridon

► To cite this version:

Béatrice L'Haridon. 'Zichang duo ai, ai qi ye': Yang Xiong Fayan zhong dui Shiji de lunshu yu chuancheng. Yi Handai rujia de wenti wei li" : . . Shiji xue yu shijie hanxue lunji , Tangshan, 2011, 9789866552878. hal-02503173

HAL Id: hal-02503173

<https://hal.science/hal-02503173v1>

Submitted on 9 Mar 2020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子長多愛，愛奇也」：揚雄《法言》中對《史記》的論述與傳承
以漢代儒家的問題為例¹

Béatrice L'Haridon 羅逸東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法國) 博士後研究人員

揚雄的《法言》部分是一本很特殊的「史記學」，包含着最早期對司馬遷的評論。嚴格來看，《法言》不是一個歷史著作，但其中一個重要的意向在於歷史人物的褒貶評論。我們經常視《法言》為模擬《論語》的空前文學嘗試，而忽略《法言》的對象，除了《論語》之外，另有《史記》。《漢書》的〈揚雄傳〉裡頭有兩種解釋，最簡單的解釋處於本傳的「贊」裡面：「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²。而最完整的解釋處於「贊」前面「自序」的部分：³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譏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⁴

按此介紹，揚雄在《法言》中的目標為回復經典的精神，以聖人為標準，可以說是一種新型的「經典主義」(classicism)⁵。但揚雄的「經典主義」以春秋末

¹ 感謝李紀祥教授給筆者如此珍貴的機會，也非常感謝蔣經國基金會的支持。

²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1983年，頁3583。

³ 有關《揚雄傳》贊前的部分是否揚雄親筆的自序，可參考 David Knechtges 的討論：*The Han Shu Biography of Yang Xiong (53 B.C.-A.D.18)*, Tempe,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2. 一個重要的論點，可以證明《揚雄傳》包含著完整的揚雄自序，在於它與司馬遷之自序的許多共同點。作者個人認為揚雄寫自序時是以司馬遷之自序為模範。如同司馬遷自序後面有他的代表著作《史記》的目次，揚雄自序後面有《法言》的目次。且《揚雄傳》異常的贊文特別長，又分為敘述及評論兩個階段，最有可能是因為要分別補充《法言》後揚雄生平的紀錄，而不要將補充的部分加入到揚雄自序原文，所以班固才會用贊的部分來敘述揚雄的晚年。如果贊前面不是自序，那麼很難理解《揚雄傳》特殊結構的原因。

⁴ 同上，頁3580。

⁵ 參考 Michael Nylan, « The Birth of Classicism in China », 法蘭西公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2009年6月23日的演講。感謝 Nylan 教授寄給作者未出版的論文。

葉的《論語》為基礎，而他針對的主要對象為《史記》。以上對《史記》的評語，可分為正面和負面。負面的是司馬遷的著作不完全附和經典的標準，正面的是漢代唯一接近孔子的模範就是司馬遷，因此司馬遷才是揚雄想要面對的近代人。《法言》本文中有兩個段落也表明揚雄對司馬遷的看法：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君子卷第十二)

在〈君子卷〉理頭，揚雄認為《史記》是前漢最重要的著作，並如此比較司馬遷與孔子。其實可以說在史記學的長久歷史當中，揚雄啟發了對《史記》的積極重視：《法言》很明顯地表現揚雄的批評精神，他於是用「聖人」最高的境界來討論當時的學術與政治。因此可以說「聖人將有取焉」是個極大的讚賞。「子長多愛，愛奇也」有兩層意義：揚雄首先強調司馬遷跟孔子的共同點為「多愛」，如同「聖人將有取焉」，在他的言語裡是個極大的肯定，可以說在漢代的作者當中，唯有司馬遷加以如此高的評價。淮南子被評為「鮮取焉爾」，司馬相如被評為「用寡」，而董仲舒在別處被評為「才之邵也」(〈修身卷〉)，但這褒揚主要牽涉到他的人格，而不是他的學術內容。

第二個意義強調司馬遷跟孔子的區別：他「愛奇」而未「愛義」。有關「愛奇」的具體內容，此得參考《法言》中如何評論司馬遷曾評論過的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

另外一個段落可以說是第一篇「歷史卷」的結論⁶：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
「《太史遷》？」曰：「實錄。」(重黎卷第十)

⁶ 雖然表面上，《法言》為一本集合零散片段的著作，但它揭示出一個比《論語》遠為明顯的結構，無論在十三卷的整理方式或在各卷內容的程序。參見 Andrew Colvin 的博士論文，專門研究法言的組織：*Patterns of coherence in the Fayen of Yang Xiong*,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2001.

這裡揚雄對司馬遷史學的評論—「實錄」—後來成為對司馬遷的定論。再者，他同時討論《周官》與《左傳》，似乎在定義一條史學線索。

除了這兩個段落，《法言》裡頭的「史記學」主要是透過人物評論而展現。

人物評論包含的歷史思想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學術範圍，而是跟倫理與文明有密切關係。就西方漢學的觀點，這般密切關係經常被視為「意識形態」(ideology)。如果在歷史著作當中存有倫理或政治上的關懷，這表示缺乏客觀性。所以歷史人物的評論這一條重要的線索經常被忽略。另外一個問題便是人物評論所強調的是異常人物的歷史命運，而對現代的歷史家來講，要寫社會歷史，必須了解「平凡」人的生活與背景。不過如果超越「意識形態」與客觀性的對立，則可以發現人物評論的寫作追求真實與正確的表達，並希望透過某個歷史人物的生命抓到某個時代的特殊意義。

一、《法言》與《史記》的多重關聯

《法言》與《史記》有九十年左右的時間距離，《史記》出於漢朝盛世的武帝時代，《法言》出於漢朝衰落的平帝時代。在〈重黎〉與〈淵騫〉兩篇中，揚雄用簡潔的文筆來評論將近一百五十個戰國末葉、秦朝與西漢的歷史人物。其中一部分是司馬遷評論過的人物，另外一部分是揚雄近代或當代的人物。在《史記》裡頭，人物品評在於每一篇「列傳」的結尾，而在《法言》裡頭，人物評論是分開獨立的。有鑑於歷史寫作的形式，可以說《法言》將歷史敘述跟歷史評論完全分開並只保留評論的部分。雖然兩個著作有如此形式上的差別，但是《法言》繼承《史記》尋求給予歷史人物正確的評論與名聲。揚雄滙集諸多歷史人物也延續司馬遷的「多愛」與他對個人的歷史生命深重的關懷。人物品評這方面，揚雄比較贊成左傳，不過有「實錄」才能寫出準確的人物評論：「或問：……『《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⁷揚雄抓住的兩個重點—司馬遷的「實錄」和「多愛」的共同存在—是一個非常值得思索的現象。

〈重黎〉與〈淵騫〉兩篇的歷史人物評論基於揚雄對《史記》的深入研究，也基於揚所具有的歷史家經歷。在司馬遷去世之後有幾個學者打算繼續《史記》

⁷ 〈重黎卷〉。

的寫作，揚雄是其中之一。但這個集體活動沒有匯集成為一本歷史著作，而他們撰寫的記錄或者失傳，或者被歸入《漢書》裡頭。最早的證據在於王充的《論衡·須頌》：

「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

《漢書》裡頭也能看到間接的證據。在〈王尊傳〉的贊文裡，班固解釋他所用的材料：

「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⁸傳王尊，揚雄亦如之⁹。」

到唐朝的劉知幾仍然提到揚雄除了《法言》之外，也曾記錄西漢末葉的歷史：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¹⁰

《法言》中的歷史思想卻還沒有引起學者的仔細研究，徐復觀先生在他的《兩漢思想史》為此感到遺憾：

「法言實由兩大部份所構成。一部份是擬論語，另一部份則在用心上是擬春秋。……很遺憾的是，後一部份，卻從來沒有人檢別出來。在兩漢任何一部思想性的著作中，找不出一部像法言這樣以大量篇幅來品評人物的。」¹¹

⁸ 有關馮商的歷史著作，見《漢書》，卷 30，頁 1714：「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⁹ 《漢書》，卷 76，頁 3239。按照張晏的注釋，班固所參考的是《法言》。揚雄即在〈淵騫篇〉裡頭贊成「王子貢(尊)之介」，但班固通常直接引用《法言》的褒貶，所以有可能這裡參考的資料不是《法言》極短的評論，而是類似記錄的資料。

¹⁰ 浦起龍，《史通通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卷 12，頁 306。

¹¹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台北：學生書局，1979 重印)，卷 2，〈揚雄論究〉，頁 502。近年來卻有幾篇論文探討揚雄的歷史思想，參見鄭萬耕，〈揚雄的史學思想〉《史學史研究》

但是因為徐復觀用同一個標準來比較《史記》這巨大的歷史著作與《法言》簡短的兩篇歷史卷，所以最後他對《法言》中的歷史思想給予不高的評價：「揚雄對歷史的事象與人物所給與的評價，對歷史變革期所給與的評價，較史公為狹為少。」¹²

為了具體了解揚雄為何重複品評司馬遷所討論過的人物，如何實現對史記的繼承與評論，我們可以比較兩個著作中對同樣一個人物或對同樣一個群體的品評。筆者曾討論過司馬遷與揚雄對「忠」不同的了解¹³，現在所想要強調的是他們對西漢儒家的政治活動不同的看法。透過兩群人物，揚雄表達他對儒家的活動的特殊觀點：漢初的叔孫通和無名的「齊、魯大臣」與武帝時代的公孫弘、董仲舒和汲黯，就是西漢儒家歷史上兩個關鍵的階段。但是這種仔細比較的成果仍然需要觀察，因為司馬遷的評論有時被後人，尤其是班固，補充或改造¹⁴。所以這個比較也須要牽涉到班固《漢書》的贊語。

二、關於漢初的儒家的評論：叔孫通與兩個「齊、魯大臣」

1998/2，頁 29-37。又見張秋升，〈揚雄歷史觀再認識〉《聊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2002），頁 49-55。

¹² 徐復觀，前引書，頁 543。

¹³ B. L'Haridon, « Le Fayen de Yang Xiong et le questionnement confucéen de l'Histoire », *Etudes Chinoises* 24 (2005), pp. 233-247.

¹⁴ 關於這一點，可參見 Y. Hervouët, « La valeur relative des textes du *Che-ki* et du *Han chou* », in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2, Paris :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74, pp. 55-76. 法國漢學家 Yves Hervouët 本來是研究司馬相如的文學作品： *Un poète de Cour sous les Han : Sseu-ma Siangjou*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在他的研究過程當中，他發現《史記》與《漢書》兩個著作的司馬相如傳有許多異同，而且不盡有《漢書》受到《史記》的影響，《史記》也間接地受到《漢書》的影響，因為有人曾用過《漢書》來改寫或是補充司馬相如傳。後來，Hervouët 又寫了一本書，仔細比較《史記》與《漢書》的司馬相如傳： *Le chapitre 117 du Che-ki (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在秦末漢初動盪的時代，叔孫通¹⁵不斷地站在政治舞台，且站得很穩。他曾當過秦朝二世皇帝的博士，陳勝起義開始即欺騙二世，之後服從項羽。他最後跟隨劉邦，放棄儒士的服裝來得到劉邦的信任，並成為漢朝的博士，幫助高祖建立朝廷的禮儀，奠定君臣關係的規律。司馬遷贊成叔孫通很了解時宜，認為儒家要適應時代的須求：「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¹⁶ 他用《老子》第四十五章的反論「大直若詘」來表達叔孫通的適應與變化能力最後使他變成漢代儒家的創立者，他「希世」也最後是一種堅持。雖然司馬遷如此佩服叔孫通，他仍然記錄兩個魯國儒者的拒絕，這是「實錄」的精神：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¹⁷。』」

在〈淵騫篇〉，揚雄用「槩人」來形容叔孫通。這個罕見的字有幾種不同的注釋。按照晉朝李軌仍存最早期的注釋，「槩人」有「見事敏疾」的意思。現代注釋家汪榮寶認為，可以用「儉」來解釋。劉師培¹⁸認為，「槩」應該要讀為「漸」，有「詐」的意思¹⁹。按照最後兩個解釋，揚雄很直接地批評叔孫通為騙子，而李軌的解釋還包含着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叔孫通為了滿足剛建立起來的漢家皇朝的政治需求就亂用秦朝的一些禮儀。所以揚雄在〈五百篇〉裡頭贊成拒絕叔孫通的兩個無名的「齊、魯大臣」²⁰：「『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透過對叔孫通的評論，揚雄表示他對儒家應該「進退與時變化」的了解跟司馬遷不一樣。透過叔孫通他可能也針對當代的劉歆用儒學來鞏固王莽的政治地位²¹。在〈五百

¹⁵ 有關叔孫通與漢初的儒家，可參見 N. Zufferey, « Li Yiji, Shusun Tong, Lu Jia : le confucianisme au début de la dynastie Han », *Journal Asiatique* 288/1 (2000), pp. 153-203.

¹⁶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8 重印)，卷 99，頁 2726。本卷也包含劉敬傳。

¹⁷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¹⁸ 劉師培，楊子法言校補，收於法言義疏，頁 600。

¹⁹ 劉師培，〈法言補釋〉，收入汪榮寶，《法言義疏》，頁 624。

²⁰ 揚雄最主要是靠司馬遷的「實錄」來寫新的褒貶評論，但偶爾也會用不同的資料。揚雄認為兩個無名的大臣從齊、魯兩國來的是一個例子。批評項羽為沐猴的遊說為另外一個例子：《史記》沒有記錄到他的名字，而《法言》叫他「蔡生」。

²¹ 感謝胡楚生教授在「第一屆世界漢學中的史記學國際研討會」(佛光大學，2008.5.27-29)提出這個看法。

篇〉，揚雄論及「誦身」的問題說：「誦身，將以信道也。如誦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為也。」儒者，甚至聖人，是可以委屈，但是最終的目標是「信道」，而不是混同霸道與王道。

雖然班固的贊語裡頭經常可以看到《法言》的影響，但是他不認同揚雄對叔孫通的觀點。在〈酈陸朱劉叔孫傳〉，班固把酈食其，劉敬，陸賈與叔孫通結合在一起，認為這四個人物對漢朝的創立有很大的貢獻。他跟司馬遷同樣地贊成叔孫通很了解時代的變遷：「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²²

總之，《法言》裡頭的叔孫通和陸賈、酈食其、劉敬不同，特別為揚雄批評的對象。這應該基於揚雄對進退的了解。他之所以將兩個無名的儒生稱為「大臣」，是因為他認為他們退隱的態度在這個時候才有大臣的風範。

三、武帝時代的儒家：公孫弘、汲黯與董仲舒

叔孫通為漢初最出色的儒生，公孫弘為武帝時代最有權的儒生，而有關他的評論也顯示出揚雄對《史記》的閱讀方法。首先要強調的是現在《史記》裡頭對公孫弘的評論特為異常，很有可能證明公孫弘的歷史地位對後世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結論的結構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司馬遷親手寫的評論。第二部分是平帝時代王元后的一道詔書。在王莽已經以大司馬的身份執政的時候，這篇文章贊揚漢家善於任用正直且節儉的大臣，並贊成公孫弘恰為此類大臣的模範。所以這篇文章的一個目標應該是肯定大臣為漢家執政的合法性。最後一部分是班固撰寫的文章，也是《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的贊語。司馬遷的評論強調公孫弘正遇到了適合的政治時刻，但不如班固的文章那麼頌揚公孫弘：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²³。」

²² 《漢書》，卷 43，頁 2131。

²³ 《史記》，卷 112，頁 2963-2964。《漢書》，卷 58，頁 2634。

但在《法言·淵騫卷》裡頭揚雄引用與公孫弘對立的汲黯²⁴。汲黯是黃老學派，他達到了主爵都尉的地位，但經常表示反對漢武帝的政策，並詆毀最受皇帝寵信的兩個儒家公孫弘和張湯：

「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²⁵。」

揚雄無名的談話對象問到近代的忠臣，而聽到揚雄的回答未提出任何一位儒生，再問董仲舒與公孫弘兩個「雅儒」是否有一個接近忠臣的理想：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張良)之智，陳平之無悟，絳侯勃(周勃)之果，霍將軍(霍光)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²⁶。』」

揚雄很清楚地批評孫弘為阿諛君主，而且強調他的品德不可與董仲舒作比。所以司馬遷所說的「遇時」，在揚雄眼裡僅是阿諛。但後來班固卻不繼承揚雄的品評，而他同樣將董仲舒與公孫弘贊揚為「雅儒」。

公孫弘代表武帝時代儒家的發展，那麼為何揚雄跟汲黯同樣地批評公孫弘為「容而已矣」？《史記》裡頭能看到不少線索。在公孫弘的傳裡頭，司馬遷解釋他之所以受武帝的寵信，主要原因就在於他精通律法，有能力用儒家經典來潤飾律法，以此增強皇帝的司法權力：「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²⁷ 司馬遷也記錄董仲舒對公孫弘的看法，其實跟揚雄的評論很接近：「仲舒為人廉直……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²⁸ 另外，與公孫弘有密切關係的張湯被司馬遷歸入〈酷吏列傳〉，並說他「舞文巧詆以輔法

²⁴ 揚雄的評論可能也繼承轅固批評公孫弘把學問當成暫時的政治工具：「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史記》，卷 121，頁 3124）

²⁵ 《史記》，卷 120，頁 3108。

²⁶ 〈淵騫篇〉。

²⁷ 《史記》，卷 112，頁 2950。

²⁸ 《史記》，卷 121，頁 3128。

」²⁹。這種說法跟汲黯對公孫弘的指控很相似。所以關於公孫弘，可以說揚雄用《史記》裡頭分散的評語來寫出一個很簡明的褒貶評論。

通過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揚雄的品評雖然表達得比司馬遷更為強硬直接，但是揚雄所利用的資料甚至是言語亦來自司馬遷的「實錄」。叔孫通與公孫弘此兩個人物都代表意料之外的成功，第一個因為他度過動盪的時代，也說服了厭惡儒家的高祖，第二個因為他從窮困平民的卑微地位達到了至高的地位。而揚雄認為有關此類的歷史人物，司馬遷過於欣賞他們的奇妙歷史命運（「愛奇」）而忽略「義」，特別是君臣之義。可以說揚雄是懷疑儒家的儒家，因此他對屬於儒家的歷史人物非常嚴格，他用儒家經典的價值來重新寫漢代儒士的品評特有趣味。漢末時儒家已變成主流，特別為王莽與他周圍的學者所利用，所以《法言》中的評論一個重要的目標便是分別甚為相似的「大聖」與「大佞」：

「或問『人』。曰：『艱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螳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烏呼！能別似者為無難。』」（〈問神卷〉）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8。

白壽彝，〈跋揚雄法言卷十、卷十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_社會科學版》第3期（1963年），頁32。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張秋升，〈揚雄歷史觀再認識〉，《聊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2002），頁49-55。

²⁹ 《史記》，卷122，頁3139。

張秋升，〈西漢儒家歷史觀的現代詮釋〉，濟南：齊魯書社，2003。

鄭萬耕，〈揚雄的史學思想〉，《史學史研究》，1998年第2卷，p. 29-37.

揚雄撰，汪榮寶注，《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1996。

樸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文學，1994。

龍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1993。

西文部分

BEASLEY W.E., PULLEYBLANK E.G.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CHAVANNES Édouard (trans.),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seu-ma Ts'ien*, 6 vols.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69).

DUBS Homer H. (trans.),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Ban Gu*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1938-1955).

HERVOUËT Yves, « La valeur relative des textes du *Che-ki* et du *Han chou* », in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2*, Paris :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74.

KNECHTGES David, *The Han Shu Biography of Yang Xiong (53 B.C.-A.D.18)*, Tempe,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2.

NYLAN Michael, "Sima Qian: A True Historian?", *Early China* n° 23-24 (1998-1999), p. 203-246.

NYLAN Michael (trans.), *Model Words (Fay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to be published.

WATSON Burton (tran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Qin Dynasty, Han Dynasty I & II*,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and New Y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ZUFFEREY Nicolas, « Li Yiji, Shusun Tong, Lu Jia : le confucianisme au début de la dynastie Han », *Journal Asiatique* 288/1 (2000).

Summary:

The *Fayan* by Yang Xiong contains the earliest appraisal about Sima Qian and his *Shiji*, as well a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historical judgments about various figures from Warring States era onto Yang Xiong's contemporary period, on the eve of Wang Mang's seizure of power. The aim of the present article is to consider this first reception of *Shiji*, not only in the frame of what Yang Xiong did actually say about Sima Qian, but also in the frame of what Yang Xiong did do, by formulating new judgments about figures already evaluated by Sima Qian before. We will keep here our comment to the problem of evaluating foremost Han literati such as Shusun Tong or Gongsun Hong an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classic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摘要：

揚雄《法言》包含著最早期的「史記學」及關於司馬遷的討論，同時也包含著兩篇「歷史卷」，其中的歷史人物品評部分地重新評論司馬遷曾評論過的戰國時代到漢武帝時代的關鍵人物。本論文將揚雄的「史記學」解釋為不可分開的肯定與批評。此理論性的討論以外，《法言》中的人物評論也可以顯示出揚雄與司馬遷的史學立場之異同。關於這一點，作者只論及一個歷史問題，就是漢代儒家與皇權的關係。在西漢末葉的時代，揚雄重新評論漢初和漢武帝時代的儒家，如叔孫通與公孫弘，特為要緊的問題。